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5), 674-681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6.145094

Hans汉斯

论加缪小说《局外人》的空间书写

何鑫胜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6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6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8日

摘　要

论文以空间叙事理论为框架，旨在分析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以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为理论参照，深入探究三类具体的空间形式及其叙事功能。论文认为，小说中的物理空间通过意象的组合，呈现了主人公默尔索的情感变迁；社会空间揭示了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公众理解之间的错位；心理空间则通过默尔索的回忆与想象，展现其自我意识的最终形成。三类空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推动小说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和深化“局外人”主题的核心线索。

关键词

加缪，《局外人》，空间理论，空间叙事

On Space Writing in Albert Camus’s Novel *The Outsider*

Xinsheng 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September 16, 2026; accepted: October 1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8,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as its framework and aims to analyze Albert Camus’s novel *The Outsider*. Drawing on Henri Lefebvre’s dialectic of spatial triad a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it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ree specific forms of space and th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them. The paper argues that physical space in the novel depicts the emo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tagonist Meursault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imagery. Social space reveal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social norms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through Meursault’s memories and imagination, illustrates the ultimate formation of his self-awareness. These three types of space interact with and influence one another, collectively forming a central

文章引用: 何鑫胜. 论加缪小说《局外人》的空间书写[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5): 674-681.
DOI: 10.12677/wls.2026.145094

thread that drives the novel's plot, shapes the characters, and deepens the theme of the outsider.

Keywords

Albert Camus, *The Outsider*, Spatial Theory, Spatial Narrativ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阿尔贝·加缪是20世纪法国文学中持续关注个体生存处境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局外人》以冷峻的语言、凝练的场景和独特的叙述视角，呈现了主人公默尔索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事件中的生命体验，由此奠定了加缪的创作声誉。自加缪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局外人》也成为学界讨论其创作思想与艺术特征的重要文本。既有研究主要围绕荒诞意识、生存困境、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展开。相关成果颇为丰富，此处不再赘述。

而关于《局外人》的空间书写，则缺少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以往的研究多围绕小说中的某一具体空间意象展开功能分析，如马爱华(2002) [1]；或者以荒诞意象为切入点，探讨意象在个人处境和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进而更深层次分析小说的荒诞主题，如杨芬(2011) [2]。可见，既有研究缺少直接从空间叙事理论分析小说空间形式和功能的成果。因此，论文意在深入分析小说中的空间类型及叙事功能，探讨其与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和主题内涵之间的内在关联。

19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研究长期将“时间”视为核心，而空间仅仅被看作是时间的附庸和社会发展的静态“容器”。19世纪中期，约瑟夫·弗兰克在其著作《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中提出了文学作品“空间形式”的概念，标志着叙事学研究“空间转向”的开始。随后，空间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学者们进而关注空间与人的经验、行为及心理之间的互动。巴赫金以“时空体”考察小说叙事形式与人物行动的联系；加斯东·巴什拉重视居所、房间等意象所承载的记忆与情感；列斐伏尔则探讨了空间的形成与人的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3]。这些理论使空间成为推动叙事、塑造人物和生成意义的重要因素。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追溯空间这一形式的形成时写道：“空间概念连接了社会与历史、精神与文化，它重构了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即发现–生产–创造[4]”。由此可见，《局外人》的空间书写并非单纯的背景铺陈，而是小说塑造人物、强化叙事张力和传达生命思考的重要方式。

基于此，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为理论参照，对《局外人》的空间类型、转换方式及叙事功能展开分析。小说重点描绘了养老院、公寓、海滩、法庭等空间场所，这些空间既构成情节推进的基本路径，也通过光线、声音和色彩等意象构建出富有隐喻意义的叙事空间，由此联结主人公默尔索的情感体验和生命认识。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既是对小说人物形象和叙事结构的一次系统解读，也是将空间叙事理论应用于小说批评实践的一次探索。

2. “空间实践”：情感变化的隐喻

弗兰克认为，“空间形式”是对文本的情节设置和时序进展的一种隐喻的表达[5]。《局外人》中的公寓、街道、海滩、法庭与监禁场所，共同构成默尔索生活和行动的空间。在这些外部空间中，光线、温度、声音和色彩随着场所的转换而改变，它们不仅作为“空间实践”的呈现形式，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

也隐喻了默尔索由疏离走向自我确认的情感轨迹。本章以直观的外部空间为分析起点，探讨空间中的意象如何参与默尔索的情感表达，为后文讨论“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提供了现实参照。

2.1. 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情感潜流

在年轻职员默尔索的人生里，他的感情、工作和为数不多的人际交往组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公寓、阳台和附近的街道是他反复停留、观看和往来的场所。小说通过房间陈设与行为习惯，呈现其疏离的生活状态。

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大小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显得太空荡了。我不得不把饭厅里的桌子搬到卧室里来……几张已经有点塌陷的麦秸椅子、一个镜面已经旧得发黄的柜子、一个梳妆台，还有一张铜床，我就生活在这个空间里[6]。

母亲离开后，原本大小适宜的住所显得空旷，默尔索便主动选择缩小自己的生活区域，把自己框定在由几副陈旧家具装饰的空间之内。生活范围的缩减，使宽敞的住宅转化为封闭的私人空间。同时，空间的收缩外化为默尔索对既有生活方式的依赖：他不愿主动改变，只按照熟悉的程序来维持生活。

默尔索的公寓临近繁华街道，他时常坐在阳台上观察行人和电影院散场的观众，却很少真正进入人群，只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记录一切。在这里，阳台成为默尔索私人生活与外部世界的临界空间，他既没有完全拒绝外界，也没有真正融入其中，而是与公共空间保持着安全距离。街道的热闹与房间的安静形成对照，重复的空间经验也成为其单调生活的具体呈现。

然而，默尔索的私人空间并非绝对封闭。墙外传来的声响、邻居的来往以及玛丽的到访，不断打破房间的沉寂。沙拉玛诺与陪伴多年的狗相互依赖，日常相处虽时常伴随抱怨和摩擦，却已成为邻里生活的一部分。狗走失后，他的哭声传入默尔索的房间，唤醒了默尔索对于母亲的思念。此时的空间经验与突然出现的回忆并置，使其以往克制的情感得以被察觉和表达。

玛丽·卡尔多娜的出现进一步改写了默尔索在生活空间中的情感经验。密切的接触使默尔索对玛丽产生了莫名的感情，可他却难以用“爱”来界定彼此的关系。当玛丽询问他是否愿意结婚时，他选择了逃避，把决定权完全交给对方。然而，联系后文在海边共同游泳的情节，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默尔索确实对未来缺少主动的规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真情实感。当他在海边听到玛丽的笑声时，他一度心情愉悦，并认真思考结婚。由此可见，开放、明亮的外部空间能够激活默尔索内心潜藏的亲近感。在公寓、阳台和海滩的空间转换中，默尔索的情感经历了由收敛克制到短暂舒展的过程，其情感表达也由日常的生活习惯转向更加鲜明的感官体验。

2.2. 光线与声色作为空间表征

列斐伏尔提出，由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生产出来的空间各自对应着感知的、构想的和实际的认知方式。“表征空间”主要由具体化了的个体文化体验空间和各种符号、意象和形式所构成[7]。在这里，空间中的意象不再是纯粹的物质客体，它们渗透着文化、社会和心理等因素，呈现出隐喻性的象征意义[8]。在《局外人》中，光线、声音和色彩等意象并不具有固定的象征意义，它们首先表现为默尔索对外部空间的身体感受，而后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并作用于默尔索的心理意识。因此，这些意象共同参与复杂的空间实践，成为默尔索感官体验和情感变化的重要表征。

在安放母亲的门房里，默尔索几次受到强烈光线的刺激。过度明亮的光线放大了家具陈设的轮廓和在场者的神态，也使默尔索产生了被注视的紧张感。这里的光线不是温暖的照明，而是一种暴露式的存在：默尔索难以隐藏自己困倦的身体反应，只能不断承受来自周围人审视的目光。这一空间场景也在结构上呼应了默尔索在后文的法庭空间中所受到的审判。

海滩最初则呈现出另一种感官色调。清凉的海水、开阔的海面、玛丽的笑声以及朋友住所中的轻松氛围，拓展了默尔索生活空间的边界，使他获得了短暂的轻松和满足。然而，这一空间并非只意味着自由和亲密。当默尔索再次走向海滩时，光线已经不再指向愉悦的感官体验。

随着正午临近，柔和的光线逐渐转化为灼目的强光，海滩所带来的舒适感随之消失。此前与默尔索发生矛盾的两名男子出现后，其身处的社会情境发生改变。沙砾、贝壳、玻璃碎片和刀刃的反光被比作“利剑”，使得开阔的物理空间转化为令人不适的感官困境。光线的变化也成为默尔索命运发生转折的信号。

刀刃闪闪发光，我觉得就像有一把耀眼的长剑直逼脑门。这时聚集在眉头的汗珠……给眼睛蒙上了一层温热、稠厚的水幕……我的视线一片模糊。我只觉得太阳像铙钹一样压在我的头上，那把刀闪亮的锋芒总是隐隐约约威逼着我[6]。

小说这一段将刀光、热浪和汗水压缩在默尔索第一人称的叙事之中，强化了他的身体反应。空间的挤压感迫使默尔索无意识地进行了反抗。连续响起的枪声，打破了海滩原有的秩序，标志着小说的叙事空间由日常生活转入法庭，这也意味着默尔索的个人行为和情感体验将被放置于社会规范中重新定义。

进入法庭和审判室后，默尔索的活动空间再一次收缩。探视室的强光、法庭中安排好的座位及集中的目光，强化了他的被观察感和被注视感。此时的默尔索失去了自由行动和言说的场所，只能在固定的位置上聆听他人对自己经历的解释。外部空间由开放到封闭的转变，也使他的生活经验被重新编排。这里虽然仍有具体可感的物理环境，但其意义已经难以脱离社会空间的影响。

出了法庭上囚车的一刹那间，我又闻到了夏季傍晚的气息，见到了这个时分的色彩……一一听出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这个我曾心情愉悦时分的所有那些熟悉的声音[6]。

尽管身处非常有限的外部空间之中，默尔索的意识却逐渐趋于开阔。行动受到约束时，城市的气味、色彩和声音却能够唤起默尔索对生活的感知。每一个夜晚，他从狭小的窗口感受夜色、星光和清晨的气息，并在聆听周围声音的过程中重新确认自身存在。此时，光线由门房的刺目灯光、送别途中的酷热阳光，到海滩上的强烈反光，再到房间窗口外通透的星光；声音也由街道的喧闹、海滩的枪声转化为与夜晚的宁静，小说中的空间意象完成了由叙事功能到情感表征的意义转换，它们呈现的情感变化并非一条从晦暗到明净的单向线，而是在感官体验、社会评价与自我想象之间反复变迁。

由此可见，《局外人》中的外部空间并非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空间范围的开合、光线强弱的变化、声音的远近大小以及色彩的明暗，隐喻了默尔索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由这些意象组成的空间实践，也成为理解默尔索情感表达的重要入口，为进一步分析其言行举止在社会空间中如何被解释，以及其心理空间如何展开，提供了必要的文本基础。

3. “空间的再现”：局外人的现实处境

列斐伏尔指出，社会空间并不是预先存在的固定场所，而是物理和精神领域上的空间经由与人类社会生活产生联系而再生产出来的结果。这一空间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具有强力意志和指令性话语的存在，它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领域[7]。由此，“空间的再现”既表现为可见的公共场所安排，也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进而影响个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及其表达方式。

《局外人》中的养老院、审讯室和法庭，便是包含特定的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的空间。默尔索置身其中，不仅要面对他人的观看和审视，还要接受他人对其言行的解释和裁定。小说前后两部分的空间看似属于两个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存在紧密联系。默尔索在告别母亲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原本发生于具体的

仪式场景，进入法庭后又被不断放大细节，并成为判断其品格的重要依据。因此，当默尔索的私人生活进入公共场所，个人经验与公众理解之间的距离持续扩大，他也就从一个沉默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任由评判的“局外人”。

3.1. 仪式空间——言行举止的错位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6]。

小说伊始，默尔索的行为便表现出了异样。由于无法负担母亲的生活费用，他将母亲送到了八十公里以外的养老院，生活习惯的不相容和长时间的通勤成为他“几乎没来探望过她”的理由。收到养老院的电报后，默尔索才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在这里，默尔索首先注意的是电报没有说明母亲离开的具体日期，而不是立即诉说悲伤。第一人称叙述只交代了默尔索能确定的事实，并未说明他的悲伤程度，日期的不确定性因而不能直接等同于情感的缺席。默尔索按照原有的生活秩序安排自己的行动，并没有以大众惯常的话语来表达感受。这种平静客观的叙述，为后文呈现他的言行举止与社会期待之间的错位埋下伏笔。

这种差别在安放母亲的门房空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抽烟、打瞌睡，拒绝见母亲最后一面，这些动作从默尔索的角度出发，只是一连串未经道德解释的身体行为，而置于告别仪式中，则容易被理解为未按预期表达悲伤的反常行为。与此同时，母亲的朋友们却一个个神情沮丧、愁容满面、细声抽泣。两种不同的告别方式被安排在同一空间内，自然形成对照。默尔索也不得已成为众人目光的中心，产生了“这些人似乎是专来审判我的”的印象。这种落差并非来自老人们真正的责备，而更可能源于他对自身处境的感知。作为社会环境中的小人物，默尔索深知自己无法满足周围人的期待，也不愿作出改变。于是，默尔索的言行举止，便始终与大众所认同的社会规范存在距离。

送别母亲的过程则进一步突出了这种错位。炎热的天气、漫长的路程和刺眼的阳光，使默尔索反复记录汗水、气味和疲惫，始终关注自己的身体感受。而母亲的老朋友贝雷兹则努力跟随队伍，用泪水和行动表达自己的悲伤情绪。与贝雷兹相比，默尔索显得格外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母亲毫无感情。在这里，默尔索的身体感受被具体描绘，情绪却少有直接命名，这种“白描”式的语言，将难以言说的情绪转化为对环境的客观感受，加强了他的言行举止在仪式场景中的不合理性。

仪式结束后，默尔索首先想到的是回家休息，并对即将睡上很长一段时间感到喜悦。这一反应延续了他以身体感受面对生活的习惯。然而，后文的法庭却将犯困、喝咖啡和没有哭泣等细节从仪式场景中抽离，放置在法庭空间中再现，纳入对默尔索为人品格的判断。由此，默尔索在仪式空间中的言行举止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在“空间的再现”中被重新审视、编码和解释。

3.2. 审判法庭——个人声音的失落

海滩事件发生后，默尔索先后进入审讯室和法庭接受质询。与养老院相比，这些空间具有更加明确的座位安排和发言程序。谁负责提问、谁可以作证、谁能够作出总结，都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默尔索虽然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却无法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完整讲述事件的过程。小说以有限的第一人称视角写他听取提问和证词的过程，展现了个体声音在社会空间中的受限和失落。

在审讯室中，桌上的灯只照亮默尔索所在的位置，法官本人却坐在阴影之中。座位的差异，使默尔索始终处于被观察的位置。面对预审法官的不断询问，默尔索仍然按照当下的真实感受回答。他不愿夸大自己的懊悔，也难以为当时的行为提供一个完整的动机。他对审讯程序的疏离，叙述为“在我看来，这些程序都是一场游戏[6]。”这里的“游戏”是默尔索对司法程序的主观感受。在他看来。他关于身体感受和情感态度的解释，无法充分回答制度所关心的动机和责任问题。因此，他发现自己的声音虽然并

未消失，却始终难以跳出制度程序的框架。

这种个人声音的失落在法庭中则更为明显。门窗紧闭、人满为患的大厅，为扩大报纸销量宣扬不实新闻的记者，恪守位置次序的审判团成员，众声喧哗的现场氛围……人群和声音充斥着法庭，经由默尔索的第一人称叙述转化为被观看和审视的感受。在这里，可感的物理环境和制度化的空间秩序相互交织。

> 庭长声称，他的职责是引导辩论进行得公平合理，以客观的精神来审视这个案件……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将坚决排除对法庭秩序的任何干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干扰[6]。

法庭审判原本应该围绕海滩事件展开。然而，在审理过程中，庭长却不断将默尔索的母亲带入案件。质问默尔索为什么将母亲送进养老院、要求院长明确指出母亲是否对默尔索有怨言、询问门房关于喝咖啡的经过。显然，庭长在审理这一事件时并没有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是将默尔索的品格和对母亲的情感态度纳入法庭审理的重要依据，用他在仪式空间中的行为来判定其法律责任，这正是“空间的再现”在司法场景中的运作方式。在这种不对等的空间结构中，默尔索为自我辩护发出的声音式微。

不仅如此，证人们的辩护，进一步凸显了个体声音的微弱。塞莱斯特试图将海滩事件解释为一次不幸的偶然，却引起庭长的不耐烦；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证词只字不能提起；马松反复为默尔索的正直人格做担保，却遭到法庭听众的不理解。这些有利于默尔索的陈述并未得到合理展开，而有关母亲告别仪式细节的追问却不断增加。此外，辩护律师以第一人称视角代入被告的立场，意在为默尔索辩护，却也使当事人的感受经由专业术语再次被转述，反而使他更难辨认和表达自己的声音。作为游离于制度程序以外的叙述者，默尔索的个人经验与公共理解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距离，使得他个人的声音最终走向失落。

综上，通过母亲的告别仪式“再现”法庭审判的空间，默尔索的言行举止和情感态度在两个相似的社会空间中被不断审视和重新解释。个人的经验感受和公共理解之间的巨大错位，成为法庭审判和决定其个人命运的重要依据，清晰地展现了“局外人”的现实处境。

4. “再现的空间”：自我意识的形成

心理空间并不是现实中的具体场所，而是由人物的记忆、想象和情感共同构成的内在世界。列斐伏尔认为，一方面，心理空间来源于我们对物理空间的感知，是在物理空间基础上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空间；另一方面，社会空间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而精神空间的形成渗透着社会关系背后的心理、文化、价值观等因素，进而拓展了社会空间在意识层面的界限[7]。基于此，《局外人》中的心理空间是一种经过“空间实践”生产出来的“再现的空间”，是由默尔索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交织而成的内部世界。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默尔索的活动范围不断缩小，而他的心理活动却逐渐丰富。外部空间限制了身体行动，记忆和想象则使他重新回到公寓、海滩和城市街道，让他在对过往的回忆和对当下的想象之中，重新理解母亲、认识生命，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

4.1. 回忆空间——对过往生活的重新理解

最初被关入封闭的房间时，默尔索保留着固有的生活习惯。他时常会想到海滩、玛丽以及可以自由行走的街道，因此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随着时间的推移，默尔索逐渐接受活动范围受限的事实，并开始转换自己的意识和生活方式。

> 于是我悟出了，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这里待上一百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他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决不会感到烦闷无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愉快[6]。

回忆是默尔索度过漫长时间的重要方式。通过回忆，他在脑海中“再现”了公寓的场景。家具的位

置、墙面的细节，抽屉里的物品，几乎都成为他可以回想的对象。对于他来说，封闭的空间并没有让他丧失时间观念，反而使曾经漠不关心的居住经验变成可供反复辨认的记忆。默尔索也由此发现，那些曾经被他视为平常的日常生活细节，如今也通过回忆的形式重新浮现。

这种回忆并非单纯消磨时间，而是推动了默尔索对过往生活的重新认识。此前，他很少主动追问行动的意义，更习惯于顺应和维持现有的生活。进入狭小的现实空间后，他不得不拓宽自己心理上的空间范围。过去那些零散的、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也产生了不可割舍的联系。默尔索开始意识到，自己并非对生活的变化毫无反应，只是习惯将情感隐藏在身体感受之中。对海水、阳光、气味和城市意象的反复回味，表明他始终眷恋具体而真实的生活。

在回顾自身经历的同时，默尔索也逐渐理解了母亲的思想和行为。母亲在晚年住进养老院后，结识了一群新的朋友，还找了一个未婚夫，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些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生命即将耗尽之际感知过去的情感体验，由此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默尔索过去并未认真思考这些改变。而当他和母亲一样身处新的外部环境时，由回忆生产出来的“再现的空间”让他回溯了母亲的生活经验，学会理解和接受他人的生活处境，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重新开始。因此，通过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和“再现”，默尔索在心理上开拓了现实中的空间边界，将对过去生活的理解和思考纳入当下的生活之中，从最初的不安、焦虑，逐步走向清醒和安定。

4.2. 想象空间——对当下生命的主动探寻

如果说回忆让默尔索重新理解过去，那么对于尚未到来的时刻的想象，则呈现出默尔索最为真实的心理状态，激发了他内心纯粹的生命本能。他在玛丽探望自己后幻想能够与玛丽结婚，也曾在审讯结束后幻想自己再次漫步在城市的街道。这些设想不是重获自由的证明，而是默尔索在生命将尽之际，试图通过“再现”生活经验来对当下怀有希望的主动选择。这一想象使他能够暂时越过外部空间的界限，确认自己将以何种方式度过当下的生命。

在那些书里，我可以找到逃脱的叙述。那我就会知道，至少有过那么一次……一个偶然事件与一个凑巧机遇发生了……最终改变了事情的结局[6]。

正因为如此，在等待最终的结果时，默尔索也曾设想命运出现转机。他希望从书本中找到结局被偶然改写的故事，并反复思考上诉可能带来的不同结果。一方面，他知道出现转机的可能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他仍然抓住这份渺茫的可能来安慰自己。这里的想象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人在不确定的处境中自然流露出的生命愿景与对现实的清醒判断。

面对法官虚伪的说辞和不切实际的现实出路，默尔索第一次完整地袒露和表达自我：“我只有这份把握，但至少我掌握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6]”。在这里，默尔索已经能够区分自己所期待的转机和此刻能够确认的现实。对于他来说，与其把希望寄托在难以预测的未来，不如抓住当下所感受到的幸福。默尔索追求的真理，不再是社会的评价体系，而是一种完全遵循自我的生命选择。

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而未温情尽失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6]。

由此可见，小说中的“再现的空间”主要由默尔索的回忆和想象构成。回忆使过往的生活经验和母亲的选择获得新的解释和认识；想象则让他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期待，主动探寻当下的幸福。默尔索的自我意识并非形成于某个突发瞬间，而是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确认的过程。作者通过默尔索外部空间的收缩和心理空间的展开，完成了“局外人”形象在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升华。

5. 结语

本文以空间为切入点，探究《局外人》中具体的空间形式与默尔索情感变化及自我意识之间的联系。小说中的空间并非单纯的故事背景，而是推进叙事、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寓、街道和海滩等外部空间，通过光线、声音和色彩意象的不断转换，隐喻了默尔索情感变化的过程，共同作用于三类空间的生产实践。由母亲的告别仪式和审判法庭构成的社会空间，则使默尔索个人生活中的言行举止进入社会评价体系之中，表现出个人经验与公共理解之间的错位。随着外部空间的不断缩小，默尔索借助回忆与想象拓展心理空间，在回顾往日生活和重新理解母亲的过程中，不断探寻当下生命的幸福。

小说中的三类空间既各有侧重，又彼此衔接。物理空间为人物提供具体的环境场所和感知世界的参照，社会空间呈现了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态度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心理空间则凝聚了默尔索自我意识的形成。由此可见，加缪通过空间的开合、转换与呼应，将默尔索的思想情感转化为可感的叙事经验，不仅深化了“局外人”这一形象，也更加完整地表达了作者对个人处境和生命价值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马爱华. 理性的沉沦与荒诞的飞腾——论《局外人》的“阳光”意象[J]. 广西社会科学, 2002(1): 175-178.

[2] 杨芬. 论《局外人》荒诞意象图式的构建[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 33(4): 139-146.

[3] 程锡麟. 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11): 25-35.

[4]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57.

[5] 王聪. 《围城》空间叙事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5.

[6] 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M]. 柳鸣九,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7] 郑佰青. 西方文论关键词: 空间[J]. 外国文学, 2016(1): 89-97.

[8] 付美玲. 张爱玲小说的空间叙事[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大学, 2015.